

闽文化通论

何绵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闽文化通论

何绵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文化通论/何绵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301-26742-4

I. ①闽… II. ①何… III. ①文化史-福建省 IV. ①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1071号

书 名 闽文化通论

MINWENHUA TONGLUN

著作责任者 何绵山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74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6.75印张 466千字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第一章 闽文化的源流和特点	(1)
第一节 闽文化的历程	(1)
第二节 闽文化源流	(16)
第三节 闽文化的特点	(36)
第二章 哲学	(53)
第一节 福建最大的哲学学派——闽学	(53)
第二节 朱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62)
第三章 史学	(72)
第一节 闽籍史学家著述特点	(72)
第二节 福建地方文献	(75)
第三节 福建金石与福建早期历史资料	(81)
第四节 福建史学兴盛的原因	(96)
第四章 文学	(98)
第一节 福建文学的发展	(98)
第二节 闽文化与福建文学	(127)
第三节 福建民间文学	(133)
第五章 艺术	(175)
第一节 福建音乐	(175)
第二节 福建舞蹈	(185)
第三节 福建戏曲	(195)
第四节 福建绘画	(209)

第六章 工艺	(220)
第一节 福建年画	(220)
第二节 福建木偶头	(221)
第三节 福建剪纸	(222)
第四节 福建陶瓷	(223)
第五节 福建石雕	(225)
第六节 福建木雕	(231)
第七章 宗教	(232)
第一节 福建佛教	(232)
第二节 福建道教	(248)
第三节 福建天主教	(264)
第四节 福建基督教	(277)
第五节 福建伊斯兰教	(283)
第八章 民俗	(291)
第一节 福建民俗的多元化	(291)
第二节 福建民间信仰与禁忌	(311)
第三节 福建游艺与饮食民俗	(316)
第九章 教育	(322)
第一节 福建教育发展和特点	(322)
第二节 福建书院教育	(327)
第十章 建筑	(334)
第一节 城市与城堡	(334)
第二节 福建民居	(339)
第三节 福建土楼	(347)
第四节 福建寺观	(354)
第五节 福建古塔	(360)
第十一章 经济	(365)
第一节 福建海外贸易	(365)
第二节 闽台贸易长期互通	(382)
第三节 始终活跃着庞大的商人队伍	(384)

第四节 福建集市贸易的繁荣	(388)
第五节 福建区域经济	(390)
第十二章 科技	(398)
第一节 闽籍著名科学家	(398)
第二节 福建造船技术	(401)
第三节 福建桥梁建造	(405)
第四节 福建雕版印刷	(411)
主要参考书目	(416)
后记	(422)

第一章

闽文化的源流和特点

第一节 闽文化的历程

一、远古及商周时期的闽文化

据考古学家推断,远古人类进入福建境内大约在早期智人阶段,即距今约20万年前。^①人类早期进入福建地域大概有三条路线,即:从江西东部入闽北、自浙江沿海岸入闽东、由广东沿海滨丘陵地带北进闽南。其第一、二条线路,必然受阻于福建重重山脉和滔滔闽江,而第三条线路,却能畅通无阻,并在漳州地区安营扎寨。^②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莱寮溪曾发现与北京“山顶洞人”时间大体相同的“左镇人”的人类化石,当时台湾与福建连为一体,有专家推断,“左镇人”是途经福建闽南进入台湾的大陆人类。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福建的最早居民,为距今约1万年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东山人”“漳州人”。1988年,清流县沙芜乡狐狸洞前后发现了六枚牙齿化石,代表四个人类个体,称为“清流人”。1987年,在东山县发现了古人类肱骨化石,称为“东山人”。1990年,在漳州市北郊发现了古人类胫骨化石,称为“漳州人”。

远古及商周时期闽地文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 古文化遗址遗物。

福建古文化遗存有代表性的如:

1. 漳州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时代文化。漳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即漳州市北郊的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为1989年兴建公路时发现,并从原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27件,其中出自莲花池山的有23件,出自竹林山的有4件,分为石核、石片、砍斫器和刮削器四种。漳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

① 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② 尤玉柱:《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

2 闽文化通论

括漳州市郊的覆船山、龙海的万宝山、漳浦的香山、东山的大帽山和诏安的腊州山等。其遗物多为陶片、石器、石片、兽骨、贝壳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推知大约在距今 7000—3000 多年这个时期里,有一部分原始居民在这里生息。由于自然的原因,他们通常选择能避风的海湾地区,在依山面海的小岛或小丘作为聚落居址,过着狩猎、捕鱼、捞贝和采集的生活。^① 漳州商周时代文化遗址,据专家考证,目前全区共发现 274 处,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冈、台地和缓坡上,以及滨海台地,小岛顶部和河流入海处的三角洲地区,遗物主要有石器、陶器、青铜器三大类。^②

2. 平潭壳丘头文化。其遗址在福建最大岛——平潭县平原乡南垅村壳丘头,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 5500—6000 年以上。其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骨器,如打制石器,磨光的石镞、石斧和骨箭簇、骨匕,以及大量贝壳和兽骨,可看出当时以渔猎为主。出土的陶器以手制夹砂陶为主,多为圆底器形,有釜、罐类和豆、盘、碗与纺轮等。

3. 闽侯昙石山文化。其遗址在闽侯县甘蔗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 5000 多年。共出土陶、石、骨、玉、牙、贝等 6 类 33 种,近千件文化遗物。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石镞为多,还有石镰、石镞、骨镞和陶网坠等。陶器以釜为多,其次是豆、罐、杯、碗、壶、簋等。有专家据其出土的遗物,推断当时人们生活情景是: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渔业、狩猎和牧畜业,有了纺织业和缝纫技术。^③ 据考古学家统计,远古及商周时期福建古文化遗址还有: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如闽侯庄边山、白沙溪头、黄土仑;福州新店浮村、福清东张等;闽江上游及西北山地地区,如浦城石排下、政和铁山、南平漳湖坂、明溪南山塔下等;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区,如:武平、龙岩、连城、长汀等地;九龙江、晋江流域及闽南沿海地区,如:泉州狮子山、东山坑北、漳浦湄力水库、金门岛富有墩等。^④ 从以上遗址可看出,新石器时代福建居民的聚集与江、海、山地关系密切,当时福建居民的足迹已遍及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沿海及有关山地。

(二) 福建远古及商周时期的原始艺术。主要为散落在各地的石刻,其中华安仙字潭岩画最有代表性。仙字潭位于华安县沙建乡苦田村,岩画刻在九龙江支流——汰溪北岸的岩壁上,目前已发现的图像有 50 多个,年代说法不

① 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88 页。

② 同上书,第 99 页。

③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 页。

④ 林公务:《福建史前文化遗存概论》,《福建文博》1990 年增刊。

一,按刻制手法、附近出土的砺石等推测,一般认为可能是商末西周前后所刻。仙字潭岩画早在 1000 多年前就被发现,但目前对其基本内容仍看法不一,有认为是记载部落战争的记功石刻,有认为是宗教性娱神刻画。尤玉柱等考古学家认为,华安仙字潭石刻是古代居民们经过艺术夸张浓缩并符号化了的一种原始图画,其基本内容是表现氏族部落祭祀娱神的舞蹈场面。专家们进一步指出:“水患和蛟螭吞食人畜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大敌,生活在仙字潭附近一带的居民,为了表达他们战胜灾难的强烈欲望,祈求一种超自然力量,从而创作一系列娱神图画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刻画出或踞、或立、或奔、或舞的氏族男女,祈求神灵的庇护,应是生活在华安仙字潭附近一带先民的生活写真。”^①除了仙字潭石刻外,盖山林、曾五岳、林焘等专家在漳州附近的华安县、龙海县、南靖县、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等地还发现了 31 处岩画,构成一条绵延数百公里的弧形岩画分布带,其题材多样,如蹄印岩画、月亮岩画、蛇岩画、小圆穴岩画、手印岩画、人脚印岩画、符号岩画等。^②此外,永定县大埠虎坑、明溪县万寿岩、南平城平崇福里仙书岩、光泽县昂山、顺昌县仙字岩、福州魁岐、福清县鹿角山、永泰县罗汉寺仙岩、仙游县石所山等,据记载都存留有各类图像文字。近几年漳浦县佛昙镇大坑村大荃山西面发现了商周时期六组画面极为原始、神秘的岩画,专家们认为,这批岩画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岩画之一,反映了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对于生殖、图腾和星象的崇拜意识。对于研究我国原始人类的宗教史、美术史和聚落形态等有重大意义。

(三) 武夷山悬棺葬。武夷山的悬棺葬分布在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悬崖绝壁上,或置于高耸岩峰的洞穴内,一般距地面六七十米。1500 年前,曾有史籍谓武夷“半岩,有悬棺数千”。清《武夷山志》统计尚存十六。据 1979 年 8 月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尚存的悬棺遗迹为:大王峰升真洞、兜鍪峰、直武洞、白云岩、大藏峰金鸡洞与鸡窠岩、换骨岩、鼓子峰、白岩、幔亭峰北洞穴、玉女峰北侧裂隙、仙馆岩东壁、鸣鹤峰仙机洞、观音岩北壁洞、霞滨岩东壁等,约 20 余处,但保存完好的已不多了。1978 年 9 月,福建省博物馆考察队从白岩高出地面 51 米的洞穴内取下一具完整的悬棺。通过考察,得知该船棺距今 3445 (± 150) 年,其纺织品残片有大麻、萱麻、丝、棉布四种质料。麻织品工艺水平略高于商代中期;丝织品为家蚕丝,接近商代同期丝织品水平;棉丝织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棉布实物资料。由此可看出,当时先民已有了高超的纺织水平。悬棺为船形,可看出当时先民生活在溪河山谷之间,与舟船结下

① 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 页。

② 同上书,第 152 页。

不解之缘,死者入葬时,削棺为船,让死者在幽冥中继续使用。

这一时期生活在闽地的先民,被《周礼·禹贡》称为“七闽”,有认为指闽地的七个小国,有认为指闽地七个种族。公元前334年,七闽北部的越国被楚国击败,越国瓦解,部分越人来到福建,与闽人结合,合称闽越人。

二、秦汉时期闽文化

据《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列入中华民族统一版图,但秦设闽中郡后,势力并没有进入福建。汉初,无诸为闽越王,建都城于福州。1996年10月29日,欧潭生、黄荣春等专家对福州新店村古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西城墙中段的发掘,得知其一期城墙始建于战国晚期至汉初,二期城墙补筑于汉初,宽达23米,并出土了战国晚期或秦朝的绳纹红砖和汉初绳纹灰砖、板瓦等残件。在中区的遗迹中,出土了汉初方格纹、水波纹、弦纹、席纹、绳纹陶片上千片,其中可复原的四件:两件方格纹大陶瓮、一件灰色硬陶盒、一件黄色硬陶杯。考古专家们认为新店古城是无诸任闽越王时所筑,即闽越王城,也称中城。当时,福州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

闽越国前后存在了92年,后因余善反叛,被汉武帝所灭。为了彻底征服闽越人,汉武帝采取迁其民、墟其地的政策,将部分人口集中地区的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但随后散居故土的闽越人又逐渐聚集,自立治县。同时,北方南下的汉族人民也与日俱增,汉族和闽越族开始杂居混合,并开始融合。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制器皿,如鼎、豆、壶、罐等,已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

关于闽越国文化,目前可查阅到的史籍记载极少,但不断出土的文物,极大丰富了人们对闽越国文化的认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为武夷山汉城遗址的发掘。汉城遗址发掘于1958年,近几年又有新的进展和发现。古汉城的面积为48万平方米,南北长850米,东、西、北三面被崇阳溪环绕。城墙为夯土版筑,周长2896米,至今完好无缺,是我国江南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其建造时间,有认为是汉武帝迁移闽越人之前建造的,有认为是迁移后散居故土的闽越人聚集后所建,但从遗址规模和发掘中遍地瓦砾、处处炭遗和烧痕的情形看,应是迁移前建造的。古汉城遗址的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福建文化的空白。例如:(一)建筑业。古汉城的建筑风格独特,特点有五:(1)因地制宜,城市面积虽似长方形,但并不规则,而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势,将城墙筑在山脊之上,高台建筑利用山坡,排水系统利用沟谷;(2)宫室为干栏式建筑,即用矮柱将整座房屋架起,下部空敞部分往往作为饲养牲畜和堆积杂

物之所,上层前为廊及晒台,后为堂屋与卧室;(3)路面铺鹅卵石;(4)方砖和土砖被广泛应用;(5)独特的排水、用水设计。(二)制陶业。出土的陶器,可分为炊煮器、储容器、日用器等,具体有:釜、大釜、甑、鼎、提梁盃、盘口盆、三足盆、瓮、鼓形罐、折沿盆、钵形盆、钵、盅、孟、碟、甗、匏壶、提筒、圈足盆、盒、圈足盒、杯形盒、圈足罐、三足罐、大缸、香薰、器盖、支座、纺轮、网坠等31种,其制法有轮制、模制等,纹饰以简单的弦纹、水波纹和方格纹为主要装饰纹样。有的器物纹样单一,有的器物则有两种以上的纹饰相组合,装饰手法可归纳为压印、旋压、刻画、缕孔、附加等数种。^①从这些器物可看出当时闽越人在制陶工艺各个方面与整个东南地区水平是一致的。(三)冶铁业。汉城出土的铁农具有凹字形镬、方形直釜镬、甬、铍;铁工具有斧、锤、凿、锯、环首刀、小刀削、铁环、曲形铁条;铁兵器则有长短铁矛、弓、刀、剑、匕首、铍;日用杂器为釜底、支架、圈、叉形器、钩形器等。^②汉城遗址中还发现冶铁作坊区,可见当时冶铁业已有一定规模。

闽越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秦汉时期,其最兴盛期应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年。长期从事闽越文化研究的林忠干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闽越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特点体现在建筑、陶器、墓葬三个方面。其建筑特点为:城邑建设一般选择在山陵上,临近溪流和开阔地,布局上因地制宜;城邑规模不算大,但多有宫殿、宗庙和仓廩,带有强烈的军事堡垒色彩。其陶器特点是:造型奇特,形制大多与广州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南越式”一致;装饰手法基本分为拍印和刻画两种,制作以细腻沙的泥质灰硬陶为主。其墓葬习俗为:墓葬形制一般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有不使用棺槨或使用棺槨两种;随葬品一种以闽越式陶器为主,一种以汉式仿铜陶礼器为主。^③

三、魏晋南朝时期闽文化

魏晋南朝时期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汉人大批入闽,经过长期交融,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为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闽越文化的影响逐渐衰微而最终成为历史遗存。

从东汉末年起,北方汉人开始大批入闽,其主要构成者包括避乱入闽者、随军入闽者、逃户、流散者及罪犯、农民起义军余部、仕宦入闽者等。福建现已发现近千座魏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可为中原人士入闽的印证。如1986年12

① 陈子文:《崇安城村汉城的制陶工艺》,《福建文博》1991年第1—2期。

② 杨琮:《崇安县城村汉城北岗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福建文博》1988年第1期。

③ 林忠干:《从考古发现看秦汉闽越文化的历史特点》,《福建文博》1987年第1期。

月于建瓯阳泽村发现的东晋咸和六年(331)墓葬,从其出土的钵、碗、盅及墓的形制可看出墓主为中原入闽的土族地主。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将乐永吉五座墓葬,其中三座有“太原廿一年”“太元廿一年”“太和四年”铭文砖,纪年砖号有“宁康”“元嘉”等,可见墓主与中原关系密切。1982年在建瓯小桥出土的永和三年(347)古墓,出土瓷器中双唇口罐为北方墓葬常见的随葬品,推断死者应为北方南下入闽的土族。1986年4月在浦城县莲塘乡吕处坞村七坊山发现的六座晋代古墓,从其出土墓砖铭文及埋葬习俗等看出:“浦城一带是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土族较早迁徙、居留的地区,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传统和习俗在这里得到继续。”^①松溪、政和、霞浦、闽侯、建瓯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猪圈、鸭笼、谷仓、谷斗、水井、狗圈,也都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②

中原北方汉人大批入闽,使福建人口增加。永安三年(260)福建建安郡,郡下有九个县。晋代分为建安、晋安两郡,建安郡治所在建瓯,下有七县,晋安郡治所在福州,下有八县。南朝时,晋安郡析出南安郡。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生产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的传入,大大推动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造船业发达。三国时期孙吴把福建当作造船基地,在福建设立典船校尉,在今霞浦县设立温麻船屯,负责督造船只。其造船工场规模大、种类多、设备好,使福建成为当时的造船中心。晋代后期,民间造船取代官府造船。南朝时,福建已能制造远洋木船,驶往印度和南洋。当时陶瓷制造业也有很大发展。魏晋南朝时期福建陶瓷以青瓷为主,各个时期造型特点鲜明,如西晋的扁圆矮墩,东晋的肥壮浑圆,南朝前期的高大圆鼓,南朝后期的趋向椭圆。^③一些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表明福建青瓷已在中国青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的纺织业也有了发展,麻葛织品质量得以提高。

佛教于西晋之际传入福建。西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即今福州市)建造绍因寺(后改乾元),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寺名绍因,有“继承”意义,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西晋太康九年(288),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为福建省见诸文字记载的第二座佛寺。建于太康年间的还有侯官(今闽县)的药山寺、灵塔寺,欧宁(今建瓯)的林泉寺。元康年间,建阳有广福灵耀院。东晋时,建阳有广福水陆院,光泽有回龙寺。南朝时期,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宋大明至南齐永明年间,在20多年的时间里,福建就建成五寺,即侯官明空寺、妙果寺,长溪(今霞浦)建

① 福建省博物馆:《浦城吕处坞会窑古墓群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1年第1—2期。

② 林存琪:《福建六朝青瓷略谈》,《福建文博》1993年第1—2期。

③ 同上。

善寺、延福寺,松溪资福寺。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闽东传播。南梁时,福建佛教又有发展,全省共建佛寺 28 所,并开始建塔,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闽县(今福州)的法林尼寺,建于梁大通元年(527),正如《三山志·寺观》记载:“闽中尼寺自此始。”隋朝时福建建寺 30 座。陈永定二年(558),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同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挂锡延福寺三年,翻译佛经,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虽然史籍对这一时期佛教在福建的情况没有更多记载,但已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是用于佛事的灯盏、博山炉、莲瓣碗、烛台等,由此可看出当时佛教盛行。

四、隋唐闽文化

隋唐时期大量外来人口进入福建,他们或随军入闽,或避乱入闽或仕宦入闽,推动了福建人口的持续增长。许多出土的墓葬,印证了北方人口南迁的历史,如根据 1966 年 2 月在永春金峰山发掘的初唐时期墓群的出土文物,专家推测:“金峰山墓群可能是隋末唐初中原宦贵衍派南迁晋江流域,寓居桃林场(今永春)的家族墓地。”^①唐开元二十一年(733),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这是福建名称的第一次出现。唐代相继设置福、建、泉、漳、汀五州,至代宗大历六年(771)正式设立福建观察使为地方最高长官,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形。

隋唐闽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兴学热推动了科举业。这一时期教育发展 with 官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使时,鼓励兴办学府,并鼓励闽人入学,常袞任福建观察使时,也设乡校,请名师教闽人。漳州刺史陈元光认为兴办学校与创建州政府一样重要,其子陈珣创办了州学;建州刺史陆长源也注重办学,劝人入学。^②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科举,据刘海峰教授统计,唐代福建进士为 56 人,虽然与中原相比并不太多,但为宋代以后福建文化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佛教有较大发展。隋开皇九年(589),莆田金仙院升寺,由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无际禅师任寺主,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修持《法华经》,大弘天台祖业,剃度僧徒百人,授三归弟子万众,是传天台宗的一代名僧。唐代全省新增寺院 735 所,但发展不平衡。如福州地区有 300 所,德宁地区有 108 所,南平地区有 204 所,泉州地区有 27 所,三明地区有 55 所。可见主要在闽中、闽东、闽北,闽南也趋于兴盛。唐代佛教传入福建有多种渠道,如仅三明地区就有远方僧人到

① 林存琪:《福建永春金峰山唐墓》,《福建文博》1983 年第 1 期。

② 何绵山:《浅谈福建教育兴盛的原因》,《教育评论》1994 年第 6 期。

此隐居修行而进行传播、从江西各寺庙传入、由广东经汀州传入、由闽中传入等,因此既有整体性,又有独立性。唐代福建高僧辈出,一些高僧如怀海、希远、灵祐、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都建于唐代,如建于唐建中四年(783)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建于唐咸通八年(867)的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唐乾宁元年(894)的福州金鸡山地藏寺、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的闽侯雪峰山崇圣寺、建于唐中和元年(881)的莆田囊山慈寿寺、建于唐长庆二年(822)的泉州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①《三山志·寺观》称当时造寺,“殫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

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等相继得以发展。制瓷业大部分在闽北和沿海一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1988年浦城县南部石陂镇梨岭朱塘窑村后山出土了一座唐代窑址,其器物“青灰较为粗糙的窑质、拙朴的造型与简练刻画阴纹、浑厚的釉汁、叠烧的技法特征,均具有唐代风格,明显地表现出产品除了本地工艺外还包含吸收继承唐越窑之技术的历史关系”^②。纺织业以泉州为代表,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泉州土贡有绵、丝、蕉、葛等,其中绵二百匹。造船业以福州、泉州为中心,天宝年间,泉州等地制造了一批高大华丽的大海船,其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底宽二丈,为尖圆形,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担。当时东渡日本的僧人都设法到福建购买这种海船。

五、五代闽国文化

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为王潮、王审知所建,首府为福州。盛时辖境为福州、建州、汀州、泉州、漳州,约为今福建省全境。光启元年(885)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南安发动兵变自立,次年攻占泉州,福建观察史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二年(893)王氏兄弟攻入福州,旋又先后占据汀州、建州、漳州。唐朝先后封王潮为福建观察史、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897)王潮卒,王审知继位。唐朝于天祐元年(904)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开平三年(909)后梁太祖朱晃又封王审知为闽王。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卒后,闽传五主为:嗣王王延翰在位不足1年,惠宗王昶在位3年,景宗王曦在位6年,天德帝王延政在位3年。如从897年继位算起,到925年卒,王审知共在位28年;如从907年算起,到945年南唐灭王延政,王氏政权存在时间共

① 何绵山:《佛教在福建》,《人海灯》总第5期。

② 赵洪荣、林长程、陈寅龙:《福建浦城唐代窑址的调查》,《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39年;如从897年王审知任威武军节度使算起,至945年,王氏政权存在时间共48年;如从893年王氏兄弟占据福州算起,至945年,王氏政权存在时间共52年。

王审知在位是闽国的黄金时代。王审知采取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对外称臣纳贡于中原朝廷,对内则勤修政事,致力于发展经济,在拓展水陆交通,扩大内外贸易、鼓励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王审知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延揽人才,曾组织大批知识分子搜集缮写各家遗书,如《琅琊郡王德政碑》所论:“次第签题,森罗卷轴”,“尝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以致教育较为普及,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当时中原四分五裂,战乱不断,而闽国却成为安定的绿洲,堪称“世外桃源”。因此,地僻一隅的闽国文化盛极一时。

闽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有三:一是文学兴盛;二是佛教繁荣;三是沟通海外。

五代闽国,福建“佛法独盛于其时”(《鼓山志》卷七《艺文碑序》)。王审知全力扶持佛教。光化三年(900),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度僧2000人。天复二年(902),他在福州开元寺建戒坛,度僧3000人。天祐三年(906),他在福州开元寺铸丈六高铜佛像一座、丈三尺高菩萨二座;越年,又设20万人斋于开元寺,号曰“无遮”。同光元年(923),为庆祝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王审知建太平寺,铸释迦牟尼像,又作金银字四藏经。王审知还特地命令浮海运木料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除王审知外,闽国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对佛教也极为热衷。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2万人。940年7月,王曦度僧万人,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受度。其侄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优礼僧人,大造佛寺,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王氏据闽时共新增了大量寺院,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南宋人黄幹在《勉斋集》卷三十七中记道:“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当时福建僧人猛增,据《三山志》载,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6万多人,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长庆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的僧人多达一两千人。一时高僧云集,不仅义存被朝廷赐号“真觉大师”,甚至连偏远的建宁溪源东霞禅院也培养出僧人到江西黎川寿昌寺任方丈。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如福州鼓山涌泉寺,王审知所施膳僧之田多至8.4万亩。《宋史·食货志》载:“初,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以法定的方式,使寺院占有肥沃的土地。当时一些贵族和富豪也舍田入寺。莆田、仙游两县许多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500余区。闽国佛教的兴盛,吸收了众多的参学者,使闽中成为天下禅客辐辏之地。

王审知积极开拓海外交通,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与东南亚的来往。王审知制定了优待外商的政策,鼓励自由贸易,并开辟了福州外港甘棠港,极力扩大海外贸易,并在福州港置有榷货务,专门管理舶货征榷事务,使泉州从原来的中转港口变为直接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闽国对外贸有着积极意义:与海外官方频繁直接往来,表明闽国对外贸已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权;统治者的直接参与和倡导,有利于自由贸易氛围的形成;促使对外贸易的扩大,以补内陆贸易不畅通之缺;从事海外贸易的人有的成为海外移民;出现宫廷向海外订货的事例。^①当时,闽国北与新罗(今朝鲜半岛),南与南洋群岛以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使者和商旅往来。舶来品如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应有尽有。一些出土文物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很好的印证。如1965年2月在福州北郊新店莲花峰南麓东宝山发掘的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内有孔雀蓝釉瓶,据专家考证,应为波斯产品,是通过波斯人或经过阿拉伯商人输入闽国的。^②

六、宋代闽文化

北宋时期福建路行政区划,有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时期设一府、五州、二军,皆为同一级行政机构,共八个,故福建号称“八闽”。由于北方汉人持续入闽,以及福建在隋唐及五代闽国时未受大的灾祸,再加上宋室南渡,政治中心转向东南,故宋代福建经济飞跃、文化发达,正如张守《毗陵集》卷六载:“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福建进士北宋时期2503人,南宋时期3482人,居于全国之首。北宋元丰时,福建户数居全国第八位;南宋嘉定时,福建的户数仅次于江西和两浙,居第三位。福建人位居宰辅之职的有18人,名列全国第三;在《宋史》的《道学》《儒林》中列传的福建人有17人,位居全国之首。在闽文化史上,宋代福建文化最为兴盛,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闽学的产生和发展。北宋仁宗时期为闽学发展的萌芽阶段,一批闽地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德,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纲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热衷于授徒讲学。北宋末与南宋初是闽学的创始阶段,二程洛学入闽,在福建得以很好的传播和阐发。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是朱熹思想形成时期,也是闽学发展成熟时期。朱熹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

① 郑寿岩:《王审知与福建对外贸易》(未刊稿)。

② 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思想体系。闽学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但属于福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①

佛教极为兴盛。宋代福建佛教更加兴旺,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两宋时福建共新建寺院 1493 座,《八闽通志》卷七十五《寺观》称福建寺院“至于宋极矣!名胜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仅福州府,庆历(1041—1048)中有寺 1625 座,绍兴(1131—1162)中有寺 1523 座。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也建得富丽堂皇,正如《三山志·寺观》载:“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宋代吴潜在《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中叹云:“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寺院经济发达,占据许多良田,正如时人韩元吉在《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宁开元禅戒坛记》中所云:“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许多达官文人都喜欢在寺院中设立自己的读书处,以便攻读之余和高僧谈古论今,吟诵作诗。南宋名相李纲在绍兴元年(1131)曾为邵武同乡宋禅师在泰宁建的寺庙作《瑞光丹霞禅院记》。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亦为全国之首。由于僧尼的人数过多,以致很多人为能出家当僧尼和住持而公然行贿。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三山志·土俗》卷载:“斋僧尼等至一万余人,探阄分施衣、巾、扇、药之属。”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止,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 49 次。当时出现不少出家的女性,南宋建炎四年,福州新尼在怀安景星尼院受戒,一次达 398 人之多。宋代谢泌在《长乐集总序》中写道:“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连闽清这样的小县,宋代最盛时亦有僧尼 260 人,宋朝皇帝还为闽清白云寺御书“白云山”三字,以竖碑寺前。僧尼人数在闽南一带也发展迅速,正如《宋会要辑稿·道释》所载:“至道元年(995)六月……是岁太宗阅泉州僧籍已度数万籍,未度者犹四千余。”皇帝为之惊骇。据《泉州府志》记载,仅泉州市区,就有“僧侣六千”,以致朱熹称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刻书业为全国三大中心之一。宋代福建刻书的特点有四,一是地域广泛,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所在地,也有偏僻小县,几乎无处不刻书;其中尤以福州地区和建阳地区刻书最盛,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二是量大,如北宋时期福州雕版印刷的两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总数达 1.8 万余卷,是另外两个刻书中心浙江和四川所无法比拟的。南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言:“福建本几遍天下。”可见福建刻书量之多。三是所刻内容广泛,有较流行的经史百家名著和诗文集、史书节本和诗文选本、时文科举应试之书、字书、韵书、类

① 何绵山:《论闽学》,《鹅湖月刊》(台湾)1996 年第 2 期。